

清朝对外体制研究

曹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清朝对外体制研究

曹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朝对外体制研究/曹雯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097 - 1453 - 9

I. ①清… II. ①曹… III. ①对外贸易 - 经济史 - 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①F752. 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2490 号

清朝对外体制研究

著 者 / 曹 雯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高世瑜

责任校对 / 王新侠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0.5

字 数 / 353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453 - 9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序 章	001
一 本课题研究之目的以及意义	001
二 本书的内容构成以及史料利用	007

第一部分

清朝藩封体制的建立与运作

第一章 藩封体制框架下的清朝与周边国家、地域的关系	019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礼制下的藩封体制	019
第二节 藩封体制下的藩封国与互市国	025
第三节 清朝藩封体制下的典范	
——中朝关系	033
第四节 清朝藩封体制运营过程中的一个事例	
——中缅宗藩关系的建立	039
第二章 清前中期的中俄关系	053
导 言	053
第一节 《清会典》里关于俄国的叙述	054
第二节 准噶尔问题与中俄关系	060

第三节 《故宫俄文史料》及其他史料呈现的 中俄关系状态·····	074
结 论·····	081
第三章 广东体制再研究·····	083
导 言·····	083
第一节 广东体制的设定和施行·····	085
第二节 乾隆二十二年前后的西北问题·····	097
第三节 江南以及江南的社会秩序·····	102
结 论·····	108
第四章 在华传教士的影响·····	110
导 言·····	111
第一节 康熙朝的中俄交涉及耶稣会教士·····	112
第二节 雍正朝及其后的中俄交涉与耶稣会教士·····	119
结 论·····	126
第五章 嘉庆朝对天主教的取缔·····	128
导 言·····	128
第一节 皇帝眼里的西洋人·····	130
第二节 嘉庆朝的国内问题·····	140
第三节 嘉庆朝天主教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取缔·····	150
结 论·····	161

第二部分

藩封体制的破绽与清朝对外体制的转换

第六章 鸦片战争前后中英争端的焦点·····	165
导 言·····	165
第一节 中英贸易的展开与英国两次访华的举动·····	168
第二节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关于平等权的主张与中国的反应 ·····	182
第三节 两次鸦片战争带来的不同影响·····	196

结 论	209
第七章 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问题	210
导 言	210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礼制下的皇帝觐见礼	211
第二节 两次鸦片战争间隙的中外交往问题	213
第三节 咸丰朝觐见问题的提起与搁置	219
第四节 同治朝觐见问题的再启与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	235
结 论	247
第八章 日本公使首次觐见同治帝与近代中日关系	249
导 言	249
第一节 副岛种臣来华换约之背后目的	250
第二节 清政府对《中日修好条规》之态度与 日本公使觐见问题	252
第三节 日本公使在京觐见活动的过程	255
结 论	272
第九章 晚清朝鲜政策与对外体制的调整	275
导 言	275
第一节 “中外外”模式在属邦地区的初行阶段 ——由江华岛事件看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277
第二节 “中外外”模式的改进阶段 ——清政府于壬午事变后的选择	285
第三节 “中外外”模式的破灭 ——袁世凯驻朝时期的对朝政策	292
结 论	301
结 语	302
参考文献	308
后 记	320

序 章

一 本课题研究之目的以及意义

目前,海内外关于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之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厚。清史研究者抑或近代中国史研究者们不遗余力地探讨近代中国状况对中国地域、环中国地域乃至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近代世界由欧洲主宰,而近代欧洲与中国之接触乃始自于中国南方偏远区域广东的对外贸易港口。由此地理原因,近代欧洲历史学者乃至现代欧美学者,在讨论近代西洋诸国与中国之关系时,习惯于从海洋立场进行观察。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研究近代中国史的日本学者身上,即将海洋贸易作为中国与周边地域、西洋诸国间发生关系的中介点。中国与周边国家或由更远地域的国家所发生的关系,是借助海洋贸易这块平台来完成的,而实现贸易的方式,在鸦片战争到来之前几乎完全听命于中国政府的主张。代表上述观念的有费正清所提出的朝贡体制论。与朝贡体制相对应,费正清又提出条约体制概念,以说明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外国,尤其与条约国(1842年以后与中国签有条约的国家)间的贸易方式不再由中国单方面主宰,以英国为首的西洋诸国开始具有发话权,并且这种发话权伴随武力背景的加重,日益挤压中国政府的传统主张而不断彰显,大有取代中国在地域间所一向倡导的贸易方式的趋势^①。这种观点的产生背景,源于欧洲近代即始自海洋贸易,每一个决心进入近代化(现代化)模

① 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式发展道路的国家，其政治机能必须围绕有利于本国从事海洋贸易而进行改良，乃至革命。所以，当来自以海洋贸易为根本的国家的人员，在观察中国最南部港口城市所呈现的对外贸易状况时，会认为朝贡体制不过是中国人从事海外贸易的一种方式，朝贡体制所代表的政治机能实质是为贸易服务，因为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华民确实受惠于与外国人所进行的贸易。贸易关系被视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的实质内容的观念，同样体现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日本学者通过考察中日历史交往的状态，以为中国之所以在东亚（中国以及环中国地域）地域内拥有长时期统御地位，与中国在东亚地域乃至亚洲地域所占据的经济主导地位有深刻关系。日本学者虽然强调亚洲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内在生命力，但是这种连续性以及生命力的存在却被明确指称，乃归功于亚洲区域内的海洋贸易。其背景为，在长达一千多年的中日交往历史中，中日间的政治隶属关系确实呈现时断时续之状态，即日本可以随意加入或游离于中国在地域内所建立的政治秩序圈；但其与中国间的经济往来却并未因上述政治关系时断时续而出现过中断。所以，通过自身历史，日本学者有理由认为中国能够与地域内其他国家保持亲密往来，较形同虚设的政治约束，更加依据的是强势的经济主导力。

无论欧美抑或日本，学者们从海洋贸易角度去观察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之关系，无可厚非；但需要提醒的是，随着观察角度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最明显的事例就是，以中亚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学者，在观察清朝中国的对外关系时，不再强调经济影响力，而代之以政治扩张，声称18世纪的中国为最具扩张能力的帝国。这犹如日本研究满洲史的学者殆无关注中国在海洋经济圈，即由东北顺时针运转至西南（以云南地区为界限）的所谓东南“弦月”地区内的影响，完全专注于清朝中国在由东北逆时针运转至西南（以西藏地区为界限）的所谓西北“弦月”^①地区的作为。上述无论萌发自海洋贸易抑或陆路疆域扩张的种种主张，均为从某一侧面，且由外向内观察清朝中国对外关系状态后所得出的结论。

本课题的基本认知即由上述研究背景开始。首先，笔者注意到清朝与中国历代王朝在疆域控制上的差异，即清朝将日本学者所描述的东南弦月地区与西北弦月地区成功统合成一个坚固实体。众所周知，在清朝到来之前长达几千年的时期里，上述两地区所各自代表的农耕势力与游牧势力一直重复上

^① 茂木敏夫著《変容する近代東アジアの国際秩序》，东京，山川出版社，2002，第17页。

演着相互抵御、抗衡、攻击的历史事件，当然这种抗衡又无疑造成了各民族间的大融合。秦始皇举其力所营造的秦长城是在上述抗衡过程中农耕势力首次显示的最大防御能力，随后的历史也一再表明此种抗衡从未中断过。其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汉、唐，无疑代表农耕势力的辉煌成就；而元则意味游牧势力的所向披靡；清朝取而代之的明朝，再次演绎农耕势力与游牧势力的苦苦抗衡。即有明一代，从未摆脱过来自游牧势力的侵扰，以致留下令人叹为观止的长城遗迹。而清朝的建立以及发展，无疑结束了上述抗衡，可谓完成了中华地域内的农耕势力与游牧势力的天下一统。与元朝不同，清朝的统治者一方面保持草原的组织结构以驾驭其藩部地域，一方面又全面接受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以统治其行省地域。在官员选派上，除满洲族官员可不受限制被派驻上述两地域外，鲜少有蒙古族官员被派驻以汉族人为主的行省地域，而在晚清到来之前，更未见有汉族官员被派驻藩部地域的事例发生。通过这种方式，清朝统治者在保障上述两地域整合为统一体的基础上，又对上述两地域进行了有效隔离。无论是强调清朝皇帝身上所具有的汉文化元素，抑或是圈点清朝皇帝身上所保留的满族特色，清朝皇帝同时驾驭行省和藩部的事实表明，其体内不可避免地混合着农耕、游牧的双重元素，其施展的政治空间横跨上述辽阔的两种社会地域，其构筑的统治方式在不得不维持各自地域性的同时，又适时保持着两地域间的某种互动。而历史事实亦证明，此种统治方式给中华地域带来了安定，中国人口在道光时期突破四亿的现象，不能不说是社会大安定下的效应。因此，在涉足清代研究时，笔者以为实不可忽略清代所具有的上述特性。

其次，清代社会状态所显示出的前近代性抑或前资本主义性，到底意味着清代拥有怎样的社会状态？海洋贸易论者往往以经济至上的价值观念考察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经济因素，以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终究不过为一种贸易保护结构；而中亚历史研究者则往往只着眼于清代中国的版域扩张，却忽略了清朝的伟大作为在于结束了中华区域内，自秦抑或先秦以来所持续存在的游牧势力与农耕势力的对抗。总之，中国社会在清代，更应该说自宋代以后所呈现出的前近代性特点，并不能遮掩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至上的基本风貌。而推崇理学的清朝统治者亦无不怀抱着作为天下共主，愿天下子民共享太平的政治理想。换句话说，维护域内以及环域内地区的安定、和谐是清朝统治者首要处理的政务。由此，我们清楚意识到传统中国是个政治大国，其在政治上的远大抱负远非经济利益所能干扰。研究者在观察中国某个局部地域的历

史现象时，或许能找到地方政府屈于经济利益而在政治上有所退让的个别案例；但如果把观察对象设定为中央政府对域内、域外事务的反应和决策时，我们很难列举出经济因素凌驾于政治因素之上的事件。这种在处理对内、对外事务上政治原则绝对优先的态度，几乎贯彻了直到英国人以武力突破中国东南海疆防线前的清朝发展史。即便在经历了前后相隔约 20 年的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在社会发展模式上固守政治道德方面依然未表现出大步退却的姿态。如果具体到某个细节，笔者以为晚清中央财政体制的拒近代化行为，实是加大了中国与欧美间的武力差距，尤其是加大了与邻国日本间的武力差距，而中央财政体制的近代化则意味着统治者需要在以仁义治理天下的传统政治道德原则上做出根本性让步。《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① 又云：“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多。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② 而得人心者则得天下。推崇程朱理学的清朝皇帝曾几次豁免天下赋税的行为正是上述理念的社会实践。若此，清末中国面对西方近代化发展模式的侵入所做出的每一次体制转型上的抉择，对充满“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③ 情怀的中国执政抑或在野的士人阶层无疑都是一种考验。因此，在观察清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时，中央政府对于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态度应是研究者必须考察的对象。而在本研究中，笔者认为，明确意识传统中国所表现出的政治道德立场是达到客观历史表述的途径。

在展开本书的研究课题——清朝对外体制的讨论前，笔者试图要确立一个始终如一的观察点。如前述，无论从海洋抑或从边塞的角度，其观察者所各自得出的结论均不可避免带有局部性，而从每个局部地域所观察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是中国的，又非中国的。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如此辽阔的疆域，所以无法以局部的历史现象去准确概括整体的历史面貌。为了避免观察中国局部社会所造成的偏颇色彩，笔者立志于将自己的观察点设定为以清朝统治者为核心的中央政府。虽然不能肯定以这个观察角度下的结论是全面而客观的叙述，但通过对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所发生事件的反应以及对策的分析，笔者或能揭示出清朝中央政权在处理对内、对外事务上的政治统一性。毕竟，

①（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大学章句，第3页。

②（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第11页。

③（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第13页。

自秦以来便开始推行郡县制的中国，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和管理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中央推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否适时，继而可行，显示着王朝的安定程度。因此，笔者坚信以中央辐射域内四方的立场进行观察，可以帮助笔者客观再现清朝中国的对外关系状况。

在谈到中国学术的时代发展时，钱穆曾感叹“有其新苗，有其旧遗，旁衍横溢，潜滋暗长于时代主潮之下，而与为推进。”^①此一断言却又极好展现出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状况的演进过程。正如日本学者冈本隆司所言，凡涉及近代中国的研究，必以近代欧洲价值观为参照标准^②。研究者若抱着如此观念，必将导致过于强调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涌现的新兴元素而忽略旧有元素的遗存。清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确实在于西方近代化元素的参与。这种参与由微不足道发展至与中国文化元素博弈，又发展至胜出中国而招致中国文化元素的衰退。然而，沟口雄三提示我们应该以300年为周期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并坚信中国文化元素的退缩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③。钱穆和沟口雄三如出一辙地指出，新兴元素的兴起虽然会暂时压迫传统元素，但却不至彻底消亡它，传统元素必会变换面貌与新兴元素并行推进，又或有重新复兴机运的到来。若此，在叙述清朝历史时，切忌过度夸张西方近代化元素的参与，但亦不能忽略西方现代化元素确实给清代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笔者以为如何把握好西方近代化元素对中国社会的参与程度，是能否获得客观而合理的叙事方法的关键所在。我们不能无限向往近代化，若此即等于说近代化所包含的元素皆成为文明高度发展的特征；我们亦不能过分强调中国文化元素的自身独立发展的连续性，若此即等于说中国文化所包含的元素从来不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进入近代社会（西力东渐）以来，清代中国一直面临如何处理西方近代化元素与中国文化元素共处抑或融合的问题。当今天历史研究者们力图客观叙述当时的历史状态时，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总之，既不过分张扬中国文化元素的生命力，亦不回避伴随西力进入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元素，是把握上述两种元素处于碰撞时期的历史真实状态的前提。运动抑或不运动，都不能走入一种极端，过去中国传统社会只认同中国文化元素，导致近代化发展滞后；而目前无视中国文化元素、一味追寻西方近代化元素

① 钱穆著《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

② 参照冈本隆司著《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 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③ 参照沟口雄三著《中国の公と私》，东京，研文出版社，1995。

之行径亦不可取。一言以概之，中国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文明价值观，不应被欧洲近代文明价值观全面覆盖。因此，笔者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尤其注意避免“泛近代化论”下的带有偏颇性的历史叙述方式^①。

以上述问题意识为基点，笔者试图重新讨论、研究清朝的对外体制。在西力东渐之前，即在中国海疆遭到无法抵御的袭击以前，清朝建立及维持了一个怎样性质抑或功能的对外体制？而在西力东渐之后，清朝所推行的对外体制在新兴元素的挑战下，开始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进一步而言，对外体制中的新旧元素在面临新时局压迫之际展现出何种状态的博弈以及又以何种方式得以并存？这样的划分并不意味着笔者倾向于将清朝对外关系的研究等同于清朝中西研究，虽然这样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清朝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即严重的比例失衡导致人们误以为清朝的对外关系几乎仅局限于清朝与西方诸国间的关系，纠正这种错误印象应成为研究者的自觉行为。在本研究中，因为强调中国传统社会政治道德理念高于经济利益的治世原则，笔者将极力把对外关系放入政治体制的大环境中去考察。具体而言，中国王朝的对外体制只是对内体制的外延，在这个框架上，笔者在研究清朝对外体制或对外关系时，不仅仅是独立观察一些涉外事件抑或对外政策，而是将其融入中国整个统治系统中来，或者说将其视为对内统治的一个外延来进行考证。因为持有上述观念，笔者关注与清朝版图相邻的一切国家或地区与清朝间所发生的关系，以及远道而来的国家或地区与清朝间所发生的关系。如前所述，清朝皇帝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行省地域的皇帝，又是藩部地域的大汗，这就意味着他在治理如此幅员辽阔的领域时，既要顾虑到与行省地域发生涉外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又不能忽略与藩部地域发生涉外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一方面将目光投注在广州这个于清中期后与西方诸国家保持了长时间繁荣贸易的南方口岸，一方面不能忽略清朝中国与拥有漫长边境线的俄罗斯间的关系等等，而对于这一切的观察又将以不脱离同时期的国内统治状态为宗旨。

再者，提出上述问题的动机尚基于以下的思考：中国文明之所以绵延五千年而未有间断，主要源于中国人在创新之余仍会保留旧有事物的精神，这种精神造就了中国历史的延续性，而上述连续性在遭遇了清末期的时代灾难

① 参照拙文《清史研究现状中的若干问题与解决方法》，《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

后是否产生了断裂？事实上，自以英国人为首的欧洲人开创了欧洲近代文明以来，其所成就的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在世界每个地域都上演了与当地旧有发展模式相博弈的历史画面，其过程或表现为吸收融合，或表现为持续抗衡。当这种模式以武力为背景进入东亚区域时，只有两个国家在经历短暂抵抗后随即展示出全面吸收融合的态度，这就是日本和泰国。而文化悠久如中国者，对于如此违背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发展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屑，直至面临亡国进而亡种的压迫。那么，清末中国所做出的改变到底意味着与自己的历史进行了怎样的割裂？这种割裂对于中国历史的绵延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如果存在断裂，现今的中国人以及未来的中国人又将以何种方式弥补上述断裂？面对自己悠久而连绵的历史，每个中国人无疑均肩负着延续中国文明的重任。据此，客观复原清代历史，包括本书所涉及的清朝对外体制的真实状态，其意义可谓重大。

二 本书的内容构成以及史料利用

源于清朝所显示的特征，在本书内，笔者将清朝时期的对外体制定性为“藩封体制”，而不是国内学界所普遍使用的“宗藩体制”或海外学者所惯用的“朝贡体制”，在日本更有学者将该体制视为“朝贡贸易体制”。笔者启用“藩封体制”概念的缘由以及动机在此后的章节内将有详细表述。

本书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题为“清朝藩封体制的建立与运作”，由五章组成，将围绕在未受到西方近代化发展模式巨大压迫之前，清朝对外体制的状态以及在实际运作中的情况来展开；第二部分题为“藩封体制的破绽与清朝对外体制的转换”，由四章组成，将围绕在受到西方近代化发展模式巨大压迫之后，清朝对自己的对外体制所做出的实际调整以及这种调整对中国统治体制产生的影响去论述。通过具体历史事件，对清朝对外体制，即藩封体制进行观察以及客观表述是本书的基本目标。各章的纲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题为“藩封体制框架下的清朝与周边国家、地域的关系”。中国王朝历来奉行维护以礼制为基础的中华世界秩序的对外体制。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融为一体的清朝，较明朝更加致力于构建与周边邻国间的君臣关系，即尽一切可能让那些被视为藩屏的周边邻国臣服于自己，并遵照中国的礼制对他们进行册封（或藩封），以确定他们在中华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接

受藩封的国家对清朝所实行的定期朝贡，其实是认同这种位置安排的表现。作为回报，清朝允许藩封国的商人可随同朝贡使节来华从事贸易。因此，笔者以为清朝在对外关系上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有多少国家来贡，而是如何实现对周边邻国的藩封以及藩封国的来贡。这些被确定位置而又认同这种位置的藩封国的存在，为中华世界秩序的推行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那些没有朝贡义务却享有在华贸易恩惠的互市国的存在又表明，清朝虽然清醒意识到自己并不持有对“天下”所有国家进行藩封的收容力，却保留了中国“天下一统”的传统政治理念，即为自己的政治理念留下发展空间，期望在将来能够对那些在中华世界秩序里未被定位的国家进行定位，最终实现各归其位、天下太平的最高统治理想。换句话说，就是清朝保留了互市国成员向藩封国流动的机会。于中国王朝，对外体制必然是为对内统治服务的，因为建立中华世界秩序的实质就是为了维护王朝直属领域的持久安定。就清朝而言，其对内、对外政策的设定以及实施仍持续着前代政治至上主义的轨迹，以实现“天下一统”这一最高政治理念为终极目标。可以说“天下观”这一大一统观念几乎支撑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笔者在观察清朝各个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时注意到一个现象：清朝以藩封体制为依据而设定的某些对外政策与同时期内为解决国内重大问题而制定的对内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性。这一现象的存在不仅证明笔者所提出的清朝对外体制乃对内统治体制的一种外延的观点，也提醒笔者在研究清代的涉外问题抑或事件时，应将其与同时期所实施的对内政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在本章内，笔者列举了中朝宗藩关系的具体运作状况以及缅甸加入中华世界秩序的过程，以具体说明藩封体制付诸实践的状态以及效果。本章是对藩封体制的一个基础考察。

本章所利用的史料基本以传统的基础史料，例如各朝实录、各朝会典、十朝圣训等为主，并从由朝鲜使节朝贡报告书累积而成的《燕行录》中获取了部分可贵资料。

第二章题为“清前中期的中俄关系”。中俄两国间的实质性往来活动起自清朝。在对外关系处理上，清朝实行的是藩封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清政府并不承认与外邦的任何政治平等关系。清前中期的中俄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历来为中外史家所争论。如果站在俄方的立场，我们从残存的史料中可以读出，俄方始终讲究、坚持与清朝间的平等关系；如果站在清方的立场，我们亦可从大量留存的史料中发觉，尽管俄方坚持与清朝的平等，但

清朝在处理中俄关系时始终未脱离自己的对外体制原则，并且在处理中俄关系问题上有过努力目标。而解析清朝立场下的清前中期中俄关系状态，以及清朝在处理中俄关系问题上有过何种努力目标，既是本章的研究目的，同时又为本书所提出的清朝对外体制——藩封体制理论提供一个实践案例。在本章中，笔者先是通过清代几朝会典的研读，得以确认：在最初的中俄接触中，清朝曾将俄国等同为朝贡国，并注有俄国来书的格式及俄使到京参加觐见互动的礼仪规范；随着与俄国来往的增多，在察觉俄国不愿屈尊陪臣地位后，清朝对于俄国的兴趣渐减，乾隆年间中俄间无任何正式通使事件即是明证；而《嘉庆会典》及《嘉庆会典事例》对于俄国的记述，表明清朝已确定将俄国列入互市国。但乾隆至嘉庆年间的中俄关系其实一直处于微妙状态。笔者遂又通过对俄国嘉庆十年派遣访华使节团活动的观察，得出结论：清朝欲借此举理清中俄关系，即曾试图将俄国导入朝贡国行列，然而由于俄国的强烈抵抗，清朝很快放弃了上述引导，却拒绝与俄国继续进行政治往来活动。这是清朝处理与互市国关系的定式：可以参与符合中国对外体制的经济活动，但无须政治往来。

关于本章所使用的史料，除了前述基础史料外，笔者尚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以及《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另外还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历史研究》编辑部合编并于2005年内部出版的《故宫俄文史料》中挖掘出不少珍贵档案，并结合海关总署编纂出版的《中外旧约章大全》，重新复原了几处历史面貌。

第三章题为“广东体制再研究”。在相继观察了清朝中国在东北、西南、西北的对外关系状态后，为把握清朝中国对外关系的整体状态，笔者遂将目光转向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域。广东体制是清朝自乾隆年间在广州地区推行实施的一项针对外国人的体制。它起始的标志是乾隆二十二年（1857）乾隆帝所颁发的一道广州一口贸易令。在这道贸易令里，清朝政府明确规定来中国从事对华贸易的外国人不得再前往除广州以外的城市进行贸易。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提到的外国人是指从中国东南沿海方面来华的外国人。如此，广州成了上述外国人来华合法贸易的唯一港口。这一现象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才有所改变。笔者选择“广东体制”作为观察对象，一方面是为了观察清朝中国在海疆地域所推行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政治与经济间的关系。通过本章的实例考察，笔者以为广州一口贸易令的颁布是清朝为了肃清中国东南沿海、确保江南社会秩序安定

的一个涉外措施，而此后相应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如保商制度的行政化、《防范夷人章程》的实施等都是为了加强对滞留广州外国人的管理；宁波贸易问题以及洪任辉天津请愿事件，其发生原因可归结为政府疏于对外国人的管理，而消除隐患的直接手段就是加强这种管理。因此说，由这一系列相关措施而构成的广东体制是一项旨在恢复广东秩序、维持中国东南沿海秩序，进而确保中国经济重地——江南秩序的对外政策。这项体制之所以在乾隆二十二年前后推出，即江南的秩序状况在乾隆二十二年前后之所以显得尤为重要，是因为清政府正在发动旨在彻底解决西北边患的重大军事行动。由此，笔者论证了在开篇中所提出的一切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均是围绕巩固国内统治，抑或维护中华世界秩序而进行这一立论。换句话说，对外政策的实施往往与国内某一问题的解决存在着互动性，这就像笔者在本章中以具体实例指出的一样，在推出广东体制这项对外政策的后面，存在清朝正在发动解决西北边境问题的准噶尔战事这一重大背景。

关于本章史料特色，笔者在继续利用基础史料的前提下，又利用了一些专辑史料，例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的《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会编的《清宫粤港商贸档案全集》等。此外，需要一提的是笔者尚利用了日本学者如岸本美绪、香坂昌纪等所收集、整理的一些经济资料，这些为佐证笔者的立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依据。

第四章题为“在华传教士的影响”。以上各章分别论证了清朝中国对外体制在边境地带的外交实践。然而，清朝政府对于生活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又抱有怎样的态度以及实施怎样的政策呢？众所周知，直到近代社会，中国迫于条约压力开始有限制地准许外国人出入中国内地之前，在华外国人多生活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口岸，而无法获取正常出入中国内地的资格。然而在清前中期，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西洋人却曾经活跃于中国的宫廷，他们的足迹甚至蔓延到中国极为偏远的地区，他们就是今人熟知的天主教传教士。清朝皇帝为什么允许传教士出入宫廷并游访中国内地呢？政府在面对传教士以及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宗教问题时实施了怎样的对外政策呢？目前，学者们往往注意到传教士给清朝中国带来的关于科技方面的影响。而在本章里，笔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传教士们在中国宫廷所起到过的作用，以及在某个时期因为这种作用不可取代而凸显出的重要性。这就是传教士在中俄关系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笔者以为，中俄关系实起始于康熙年间，而乾隆二

十四年（1759）是中俄关系发展的分水岭。之前可称作中俄关系的早期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专注解决事关边境安危的外蒙古以及准噶尔问题，极力避免强邻俄国成为新的敌人；而俄国忙于向西扩展，也无意在远东与中国发生激烈冲突，因此双方交涉频繁，力求保持均势状态。在与俄国人早期的接触中，中国官员意外发现精通拉丁语的传教士是双方书信往来、谈判沟通时不可缺少的人物。康熙年间，耶稣会教士在北京非常活跃。他们精于天文算学，满足皇帝学习数学的欲望，利用西药帮助康熙帝摆脱重疾，运用欧洲测绘手段制作舆图等等，而真正让中国高层对他们另眼相看的却是他们在中俄交涉里的语言沟通作用。在京传教士的这一特殊地位在 1728 年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未受到丝毫动摇。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在发生了礼仪之争以后，康熙帝仍然维护在京传教士的立场。雍正时期，巴明多是唯一受到皇帝恩遇的在京传教士。他的地位之所以高于其他传教士是因为他所具备的拉丁语能力而非天文算学能力。这足以解释雍正帝在颁布禁教令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将所有的传教士驱逐出中国。之后，由于俄国坚持往北京输送学习满汉语的学生以及中国政府在北京努力经营两所语言学校所达到的效果，耶稣会教士在中俄交涉里曾经拥有的影响由动摇渐至消散。

关于本章所涉及史料，笔者大量利用了由俄国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翻译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这部资料集虽然为学者们所熟知，但依然不失其珍贵性。

第五章题为“嘉庆朝对天主教的取缔”。至少到嘉庆朝，西洋传教士是一批生活在中国的具有特殊身份的外国人。他们依靠自己精湛的西洋技艺得以服务于中国的宫廷，并由此享受到普通外国人所不能享受的在中国内地生活的待遇。虽然我们不停地强调传教士给中国科技抑或国际语言沟通方面所带来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传教士来华的最初亦是终极目的——将中国基督教化。源于上述终极目的所引发的社会伦理观念问题，进而社会秩序安定问题，导致最初受到欢迎的传教士最终遭到被完全取缔、驱除的下场。这是本章所要讨论、阐述的主题。嘉庆朝的社会问题主要来自民间宗教所引发的动乱。受白莲教长达 10 年的侵扰，嘉庆朝对于民间宗教信仰的监控尤为严厉。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此背景下遭受沉重打击。在本章，笔者通过翔实例证，说明天主教是如何被作为中国民间邪教之一而加以彻底取缔的，由此再次论证了笔者所提出的观点：涉外政策的实施往往与国内统治状态存在着互动。